

# 我与顾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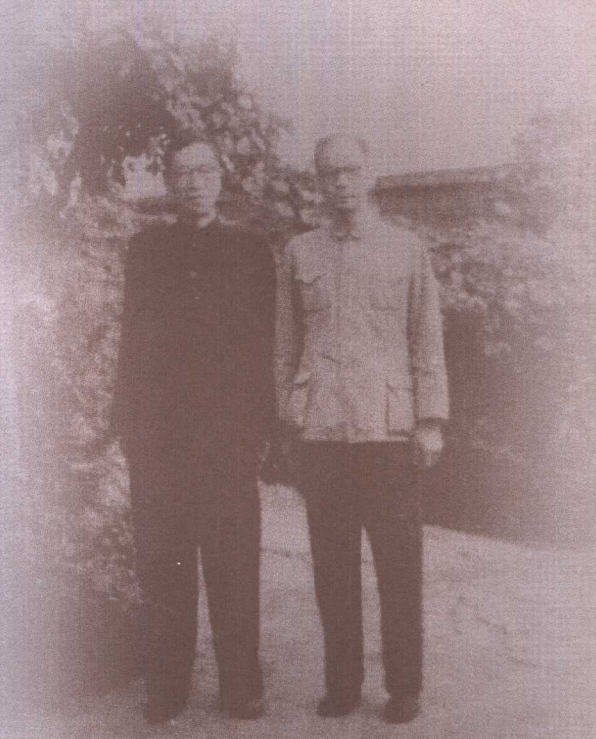
WOYUGUZHUN

陈敏之著

理性与宽容      顾准生平和他的学术思想  
读《顾准文集》札记      关于《老子》的笔记  
《孔子》笔记      关于韩非的笔记  
我与顾准      顾准传略      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  
顾准的最后十年      顾准和他的儿女们



上海文艺出版社



# 我与顾准

WOYUGUZHUN

陈敏之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顾准/陈敏之 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6

ISBN 7-5321-2541-6

I.我… II.陈… III.顾准(1915~1974)一生平事迹 IV.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742 号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王志伟

我与顾准

陈敏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41,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2541-6/I·2002 定价:2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9178575

---

## 序

---

顾准 1974 年 12 月去世至今,三十年过去了,人类历史又跨过了一个世纪,进入了新的 21 世纪。人类社会总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缓慢地往前发展,但也总是一步一步地在进步。

顾准去世以后的这将近三十年间,我曾陆续写过一些有关顾准的文章,散见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早就有这样一个心愿,想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一个集子,既作为一种纪念,也可为读者提供一些检索的方便。三四年前,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便把已经编好的稿子交了去,谁知该社的总编认为内容重复,要责编重新改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时罗银胜、高建国著的《顾准传》已先后出版),这显然和我原意大相径庭,往复几次,不能达成一致,最终只能以撤稿作罢。去年(2002 年)年初,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同志获知此事后,善意地为我介绍一家出版社,我满以为这个集子的所有文章,都早已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应该不会存在什么窒碍。大约半年之后,经探询,告以上交任务重等等,迟迟未能发稿;我当然能够予以理解,不想强人所难,也就把稿子拿了回来。

顾准几次蒙受厄运(尤其是最后一次),在他和我通信中,常常以“白虎星”自称、自责,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作为父亲,不能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反而因为自己的缘

故,使孩子在同学中受到歧视,甚至遭到凌辱,这种情况,顾准是不知道、或者不会完全知道的。但是,孩子的心灵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作为父亲、母亲,明知自己受到的是不正当的对待,但是孩子这时还小,能够把真实的情况如实地向孩子明说么?孩子能理解么?如果孩子稍稍有一点反抗的表示,不是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么?“文革”时期,这是一个黑白完全被颠倒的年代,迷信盛行,谬误被说成真理,铺天盖地,势如千钧,谁要是对它有一丝怀疑,就立刻会被压成糞粉,为了保护孩子,做母亲的只能按照当时实行的划清界线的要求来教导孩子。但是当真理终于昭然重见天日,知道自己犯下了错误,孩子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在这里,我愿意郑重地宣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不应当由顾准的孩子来背,应当由“文革”这个时代来背。

“三反”以后,顾准从上海调去北京,我除了利用去北京开会的空隙,有机会和顾准短暂的晤见外,平时很少相见,通信也不多(除了1973、1974年这两年特殊例外),和顾准的孩子见面更少,相互作倾心的交谈更可说没有,我所知道的关于他孩子的情况,都间接来自他们的父亲顾准,作为他们的长辈,应当坦率地说,我对他们的关心是很不够的。在顾准去世前后,我对顾准孩子的态度也确有情绪化的地方,所有这一切,我恳切希望:愿它化作烟云,随风飘散吧!

二〇〇三年二月六日于华东医院

# 目次

序 .....	( 1 )
我与顾准 .....	( 1 )
顾准传略 .....	( 8 )
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 .....	( 22 )
顾准的最后十年 .....	( 27 )
顾准和他的儿女们 .....	( 37 )
顾准的家庭悲剧 .....	( 49 )
顾准的妻子——汪璧 .....	( 55 )
《希腊城邦制度》读后记 .....	( 61 )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 .....	( 64 )
从诗到散文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 .....	( 68 )
《顾准文集》序 .....	( 76 )
《顾准文集》出版前后 .....	( 86 )
关于《会计原理》出版的追记 .....	( 89 )
我不过为恢复顾准的形象作了一点努力	
——《顾准寻思录》序 .....	( 94 )

理性与宽容 .....	( 97 )
关于《顾准日记》编辑上的一点说明及其他 .....	( 102 )
重读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札记 ——纪念顾准同志诞辰七十周年 .....	( 106 )
从《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说起 .....	( 124 )
顾准生平和他的学术思想 .....	( 134 )
读《顾准文集》札记 .....	( 180 )
关于《老子》的笔记 .....	( 188 )
附一：《〈老子〉笔记》读后感 .....	顾准 ( 216 )
附二：老子的“无名”是反对孔子的伦常礼教的 有名论的吗? .....	顾准 ( 226 )
《老子》今释及批注 .....	( 235 )
《孔子》笔记(一) .....	( 277 )
《孔子》笔记(二) .....	( 289 )
附：《孔子笔记》读后感 .....	顾准 ( 304 )
关于韩非的笔记 .....	( 309 )
韩非的利害关系说和君主中心说 .....	( 324 )
附：评韩非 .....	顾准 ( 327 )

## 我与顾准

每一个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每个人的历史都有幸、有不幸。幸与不幸，常常是各种偶然因素和偶然事件凑合的结果，不由自主。

生长在同一时代的人们，他们的历史背景是相同的，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相同的历史投影；然而每个人的遭遇又不会相同，他们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状况、工作环境、亲友交往，以及这些对每一个人产生的影响也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否则，如果千人一面，这个世界会变得十分单调、枯燥，所有一切绚丽多彩的艺术也就不可能产生和存在，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个性化的，没有个性，也就不会有什么艺术。

我也在写自己的历史。我的历史大概可以归入不幸的这一类，因为当我开始写第一章的时候，我便遇上了不可预料的不幸事件。1937年7月18日下午（这是一个星期日），我在上海北站铁路以北的虬江路上践约去看一个人（这个人现在可以肯定他的身份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内奸）时，被预伏在那里的国民党中统三个便衣特务绑架逮捕。这时，虽然七·七芦沟桥事变已有十一天，虽然离“八·一三”揭开全民抗战的序幕也不过二十多天。相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此时已进行多时，双方似乎也已达成了国民党不再逮捕共产党人，已捕和关押的共产党人也将被陆续释放的协议。



这对我当然是一件猝发的突然事件,事前不可能有任何预兆,事发当时也会一时觉得不知所措,只能听其自然。这年我才十七岁,入党才不到一年。从审讯中我逐渐弄明白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我追捕顾准。这个目的他们没有达到。但是我确实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对于这个个人历史上的污点,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自己辩解,更没有想过加以抹煞,因为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件,一旦已经成为历史,对于个人不论有什么利害关系,都是不容抹煞或改变的。我认为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对历史应抱的态度,包括我自己在内。

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在其一生中,不犯错误大概是没有的,至少是很少见的。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常常不是根据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没有,错误的大小、性质和严重程度,而是根据他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态度。有些人对自己犯的错误直认不讳,坦荡、诚恳;有些人则不然,不但文过饰非,诿过于人,而且继续制造一些荒诞的理由欺世惑众,两者迥然不同。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至今已活过了八十岁,成了跨世纪的老人,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这十多年来,我明显地感觉得到我的健康状况是在走下坡路,七十岁过后,更是加速地下滑。1994年,我以多发性脑梗阻(俗称小中风)住院近半年;1997年,因胃癌切除胃四分之三;2000年,因不慎摔跤,经检查为慢性脑血肿,又做了颅腔引流手术,头部打了两个洞,引流出血污140cc;2002年9月30日午夜,因心脏病急性发作,又住院至今。总之,这些都明白地在告示自己,我已经走进了自己的暮年。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自然过程,任何人概莫能外,上至盖世英雄、伟人,下至凡夫、俗子,有哪一个能逃脱这个轮回。死,并不可怕;所虑者,为病魔所缠,最后落得个既不能读、写,又不能思维、生活不能自理,完全失去自主能力,那可可怕。不过,在我没有完全丧失读、写、思

维能力之前,也就是在我已经不多的余年,还会尽我力之所及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这是我唯一的愿望,但愿不会成为奢望。

人到老年,常常会想起往事,我也不能免俗。然而在我的一生中,却找不到一丝峥嵘岁月,有的只是身上的创疤;当我抚摸这些疤痕时,除了苦涩外,再也找不到别的。仔细想想,也许这不是坏事,原来在我身上的犟脾气和一股冲劲,磨掉了不少,这样,也就使我能安全地度过解放后历次运动的劫难。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次浩劫,我仍然未能幸免。我被扣上了“大叛徒”的帽子,在机关大院的地上刷起一米见方的大标语,然后又把我送进了“少教所”<sup>①</sup>,从1967年11月至1969年9月,共关禁了将近两年。又过了十年,1979年才推翻了“文革”中间给我作的结论<sup>②</sup>,并且由我自主选择了我感兴趣的工作。

反观自己的一生,整个的色调是灰暗的,找不到一个亮点,不过,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有违良心和良知的事,这也许是差可告慰自己的。

1965年,当我获悉顾准(五哥)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时(当时我正患病住院治疗),曾经写过一首诗送给他,这件事经过“文革”浩劫,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完全消失。他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又偶然发现了,他自己抄写了一遍,并冠以“赠诗”的标题,保存得

---

① 全称为少年儿童教养所。解放前原为漕河泾监狱,“文革”中改为一个特殊的拘留所,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干部几乎均集中关禁在此处,由解放军派驻部队警卫。

② “文革”中原来给我的结论是:“定为叛徒,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清除出党。”1983年6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沪委组83字第720号关于恢复陈敏之同志党龄的批复:“经研究同意你们的意见,恢复陈敏之同志一九三六年九月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

很好,可见他对此诗是颇为看重的。关于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这首诗也许可以表达了,不过,我还想说几句。

1927至1934年的这七年,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最艰辛的年月。1927年,原来有十个兄弟姊妹的大家庭终于分裂了。分裂以后,以我母亲、外祖母为核心的这个单元共七人,这时七弟刚一岁、三妹五岁、我七岁,五哥(顾准)十二岁,二姊十三岁。这样的年龄结构,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面,要能够生存下去,是何等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在《赠诗》中开头的几句:“兄年十有三,稚气犹未除、为觅衣和食,独力负重荷,老母有所养,弟妹得庇护。茹苦复含辛,二姊因殇殁。”说的完全是实情。为了求得最低限度的温饱,为了度过这艰难的岁月,二姊几乎日日夜夜伏在绷架上干刺绣活,藉以得到一点微薄的收入,为此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1934年,在她二十岁时去世了。她默默地走来,又默默地去了,她是永远值得我怀念的姊姊。

父亲这时已年过半百,须发皆白,在一个由几个民族资本家举办的慈善机构(联义善会)中任管事,每月只有微薄的薪酬,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外,能够拿出来抚养我们这几个还是童稚的子女的十分有限,在我的记忆中每月由我到父亲那里拿回的津贴只有五元钱。大哥比七弟大二十四岁,已结婚,也有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他从伯父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伯父没有男孩,大哥是伯父的嗣子,伯父开了一家花行,仅有两个女儿,其次女至今还健在,年已九十五岁),这时大概也已挥霍殆尽了。二哥二十二岁,在中华职业学校,高中毕业后,似乎在黄炎培办的甲子社工作。大姊十七岁,其时与二哥单独租屋居住。三哥十五岁,开始在一个花行学徒,后来五哥将已经考取持志大学缮写员的职位让给了三哥,也算有了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业。三哥人极聪明,在做好缮写讲义的本职工作外,利用空余时间去旁听,以后争取到了正式旁听生

的资格,最后似乎还得到了学位,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懂得几种外语,除英、日语外,还懂德语、法语,能自由阅读这几种外文的书籍。当时南市老西门一带有很多旧书店,星期六他从江湾持志大学回家来,经过老西门总要淘一两本廉价的书回来,他对哲学似乎特别有兴趣,至今在我的记忆中还能记得起来康德、斯宾诺莎等这些西方哲学家的名字,显然是幼年时残留下来的痕迹。1936年,他曾翻译过一本《从一个新世界看一个人》,公开出版,现在大的图书馆里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到(徐懋庸翻译的巴比塞的斯大林传,书名叫《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三哥翻译的这本书,原著者是谁,已记不起来,但因为两书的书名正好颠倒,印象深刻,因此还能记得。四哥进了中医专科学校,父亲此时在联义善会似乎还行医,四哥随侍,帮父亲抄写药方。四哥写得一手好魏碑体,30年代中期,五哥从事地下活动,一度我们家成了武装自卫会宣传部的机关,所有印刷品都出自四哥之手,由他刻写的蜡纸印成的印刷品,都极清晰,字体也漂亮。他默默地工作,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1937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一个人不事声张地到了武汉,又转到了山西太原,在那里参加了由李公朴主持的民族革命大学,并且与三哥相遇。太原沦陷,转到临汾,三哥过黄河到了西安,四哥没有离开,据说在一次日军轰炸中牺牲了。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的烈士名单中,应当写上他的名字。

从1927年到30年代初的这几年,顾准从十二岁的稚气未脱的少年,凭借他的才智和勤奋,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青年。在这短短的三五年中,他提高了他的职业地位,从而使他的家庭得以逐渐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免遭冻馁之苦,他还十分关注当时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竭尽全力去探索和寻找从根本上救国救民之道。

1934年,顾准十九岁。是年他写成《银行会计》一书并由商务印书馆以“大学丛书”名义正式出版,一时上海几所大学如之江、

沪江、上海商学院等纷纷向潘序伦要求介绍老师前去讲授银行会计，潘序伦介绍顾准前去，均以年资过小为辞不予接受，潘序伦答以目前国内只此一人能讲授、别无选择，最后只能接受下来。从此顾准又登上了大学讲坛。也是这一年，顾准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上海青年会组织的读书会中找到了党，并于翌年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也在这一年，离开中学考进了上海生活书店当练习生，开始写我自己的历史。二姊和外祖母也在这一年先后去世，正好五哥这时有一笔数额不算小的稿费收入，这样才不至于穷困得连丧事都办不起。这一年冬，顾准与汪璧结婚，他们另外觅屋居住，从此离开了老窝。

人们常说：“性格就是命运”。此话不具有绝对性，但是仔细琢磨，也有一定道理。什么是命运？命运是人生过程中常常会遇见的偶然因素或偶然事件，对于这种偶然因素或偶然事件，对于一个性格比较圆通的人，常常因为应对得当，比较圆滑、得体，因此就会在好与歹两种可能的变化中向好的方面转化；但是对于一个把是非看得很重、放在第一位，而性格又十分执着，不愿意也不善于圆通应对的人，常常明知其结果对自己不利，也宁愿面对不利走去。这样，在两种不同的可能面前，性格所起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

顾准出身卑微，以一个十二岁的少年进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新式学徒），只有旧制初中二年的学历（旧制中学初中只二年），如果没有一点自信、执着的追求，能够靠自学成才，在只有短短七年的时间里写出当时在国内还是空白的《银行会计》么？在寻找救国救民根本道路的过程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远比抗日救国更为远大得多的人类的理想。在往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多次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其中不少明显地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精神相悖或相抵触，但他没有怨怼，而是促使他更加认真的去研读马克思的原著；“文革”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了这场

狂风暴雨,只有他写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大字“读史”,这是一个真正的对现实、历史进行认真严肃思考的人才能持有的冷峻态度。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这离不开西方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在他晚年,决心花费十年时间上下求索,追本溯源,去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以至西方社会历史的演变,终于弄清楚了至今影响着世界历史的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源流及其演变的脉络。对于这样一个把生命也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人,我们还能忍心对他说半句责备之词么。

2003年2月4日于华东医院

## 顾 准 传 略

顾准于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不治病逝,至今已十四年。随着时间的流逝,丧失亲人的感情上的冲击已经过去,现在更多的是理智的思索。然而,由他的亲人来为他写传略,仍不免蒙上一点感情色彩,虽然这篇容量不大的传略并不企求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的评价。

顾准,1915年7月1日(农历5月19日)生于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兄弟姊妹共十人,在兄弟辈中行五。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姓。原籍苏州,民国初年父亲一辈举家移居上海。父亲晚年从业中医。顾准以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学制为两年)毕业后,由留云小学母校教师殷亚华推荐,经王志莘<sup>①</sup>介绍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

---

<sup>①</sup> 王志莘,20年代初与潘序伦一起,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玉玠资助去美国留学。曾任由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校长,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属《生活》周刊主编(该刊后由邹韬奋接办),解放后曾任新华银行行长。

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正是我国民族工商业有相当发展的时期。潘序伦从美国学成归来,移植到国内的新式簿记——现代会计学,是完全不同于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的一种新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它借助科学原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按其不同类型的具体特点,设计各种不同的会计制度,是进行系统的记录、计算、分析、检查的一种方法和工具。它较之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要精确、及时、科学得多,因此受到开始运用现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的新兴工商业者的普遍欢迎。适应这种社会需要,潘序伦的会计事业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扩展到立信会计补习夜校,以后又创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会计编辑所、立信会计用品社等。当时在众多中小工商企业中从业的中小职员、练习生、学徒,迫切要求增进业务知识,改善社会地位;因此,这种业余补习、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不仅受到他们的普遍欢迎,也得到多数企业家的支持,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和会计事业在这一期间得到极大的发展。

1927年,顾准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时,不过十二岁。以后经过勤奋自学,逐渐学会和掌握了会计学这门学科。然而毕竟年纪还小,稚气未脱,因而曾经闹过这样的笑话:当他第一次登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讲课时(当时只十六岁),竟被学生轰下了台。一年之后,第二次讲课才算站住了脚。

从1927年到1940年离开上海,顾准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前后工作十四年。他从刻蜡纸、印讲义、改课卷,到在夜校讲课、担任夜校部主任、撰写会计学著作,在之江、沪江等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时期,是他职业向上时期。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会计著作《银行会计》,此时不过十九岁。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这些著作中有不少是作者在动荡不定的流亡生活中



写成的。这些著作出版问世时,有的用了顾准自己的名字,有的署了别人的名字。

值得在这里提到的是,顾准与潘序伦的关系。1934年顾准参加革命活动以后,曾几次被迫流亡。潘序伦对顾准是一个危险的赤色分子并非没有觉察,但他对顾准几次进出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仍然采取容忍态度,并且还同意他可以采用在家撰写会计著作这种更为自由、也更适合于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职业方式。甚至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向潘序伦提出警告以后,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潘序伦对顾准是爱其才,也敢于用其才(潘序伦在生前直到晚年还常这么说)。不问其政治面貌如何,采取了一种开明、宽容的态度,这使顾准和他的家庭因此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条件,这在30年代的旧社会,确实难得。

## 二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亡;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失败,国民党坚持奉行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普遍的民族觉醒的推动下,顾准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了革命活动。经过1933年下半年的积极活动和酝酿,1934年初,以顾准为核心,成立了一个自发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进社。参加进社的最初成员是团结在顾准周围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和立信会计补习夜校同学中的先进分子。第一批成员有顾准、李建模、李少甫、陈怀德、夏舜凯(以上均已故世),李燮泉、沈尉平、童志培以及不久以后参加的汪璧(方采秀,后与顾准结婚)、王纪华(王文清)(以上两人亦已去世)。进社成立不久,即与党的外围组织远东反帝同盟建立了联系。在“远反”的指导下,进社起草了自己的